汪洪清：长征过草地走了49天

2026年7月下旬，武汉籍开国少将汪洪清之子汪中原在郑州接受记者采访，身上穿的是一件15年前花45元买的上衣和一条穿了20年的裤子。

“能穿就穿，没必要浪费。”汪中原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衣服，回忆起了父亲的生活习惯。

一家人吃饭，米粒掉在桌上，汪洪清都会捡起来放进嘴里。菜吃完了，盘底剩点菜汤，他倒些白开水一兑，用筷子搅一搅，再端起来喝掉。

汪洪清11岁进纱厂当童工，20岁参加宁都起义投身红军，23岁随中央红军长征，从普通红军战士成长为政治干部。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。



1955年，河南省军区获授少将军衔的同志合影，左三为汪洪清。

纱厂“孩子王”成为红军战士

1911年，汪洪清出生在汉阳县鹦鹉洲瓜堤河街（今汉阳区鹦鹉洲一带）。1922年至1931年9月，他在武汉裕华纱厂当童工、工人。

年幼的汪洪清每天在机器间穿行，搬运、清扫，一干就是十几个小时。监工拿着棍棒在车间里来回巡视，工人稍有不慎就会遭一顿毒打。汪洪清后来形容那段日子：“头上泡泡垒泡泡，天天肚子吃不饱。”“泡泡”是指他挨打后头上鼓起的包。

汪洪清不是肯低头受气的人，在同龄孩子中很有号召力。纱厂里，谁被欺负刁难了，他都敢站出来鸣不平。

汪中原这样评价父亲：“他就是小孩头、孩子王。”那个年代，没什么好吃好玩的可以分给伙伴，能让人心甘情愿信服的，是“你受欺负了，我护着你”的义气。

1926年，15岁的汪洪清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。

1931年10月，他进入国民革命军第26路军，从事通信工作。2个月后的12月14日，26路军在江西宁都起义，加入红军。起义部队随后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。

军团长给他让马

1932年2月，汪洪清加入中国共产党。此后，他从普通战士、政治干事，一步步成长为红军政治干部。

这年春天，红五军团第15军从瑞金任田市出发，准备攻打赣州。当时，汪洪清在15军交通队当电话兵。

出发第一天，他就开始发烧。起初，他没声张，想着“走走路、出出汗就好了”。第二天，他病情加重，浑身发冷、打哆嗦。中午前后，他实在走不动了，便钻进路边一个破草棚，蜷缩着等后面的部队。

“同志，你是哪个单位的？怎么躺在这里？”

听见有人喊，汪洪清有气无力地说：“15军交通队的，病了。”

来人问清情况，立即让警卫员扶他上马。

直到这时，汪洪清才知道，眼前这个穿着灰粗布军装、脚穿草鞋，还背着一支步枪的人，竟是红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。

这个身份，让他一下想起了此前在白军中的经历。有一次给旅长接电话稍微慢了一点，汪洪清挨了一顿臭骂。

眼前这位军团长让警卫员扶自己这个普通战士上马，自己背着枪步行。

汪洪清不敢骑。董振堂却执意坚持让马。一路上，董振堂背枪步行，还不时回头看看马上的汪洪清。休息时，他把水壶递给汪洪清；到了宿营地，又让警卫员给他弄面汤；天黑后，派担架把他送回15军交通队。

汪洪清后来专门写文章回忆这件事，他还记得军团长的话：“红军和白军不一样，白军军官压迫士兵，红军官兵平等，是阶级弟兄。”

很多年后，汪洪清成为政委、成为将军，待战士都极亲和。

突围后掉头冲向敌阵救战友

1933年11月至1934年3月，汪洪清在中央苏区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高级班学习。

1934年4月，江西广昌，这是中央红军长征前夕第五次反“围剿”中的惨烈战场。红五军团第13师37团在云际寨、大罗山一带阻击敌军。汪洪清当时在该团1营任营长，和营教导员袁文一同巡查阵地、安排防务。

4月21日，敌军第96师猛攻云际寨。1营连续击退两轮冲击后伤亡较大，接到撤至第3道防御地带的命令。汪洪清安排通信员通知袁文带领3连撤退，自己率1连、2连先行撤出。队伍后撤三四里地后，他始终没有看到3连的身影。

汪洪清当即判断袁文和3连陷入了敌军包围，对着身边官兵高声喊道：“3连还没有撤下来，走，我们拼死也要把他们救出来！”话音未落，他便端起一挺机枪，带头调转方向冲向敌阵。

汪中原后来听父亲讲过那天危急时刻的场景。战士们拼死相搏，硬是撕开敌人的包围圈，救下被围困的3连，又找来2名战士，拆下门板当担架，将袁文救了出来。

1934年10月，中共中央、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进行战略转移。汪洪清随红五军团踏上长征征途。

土匪一听他名字躲着走

长征中的汪洪清有一个重要身份——敌工干部。

1935年，他担任红九军团政治部敌军工作部部长。该军团承担战略掩护任务，四渡赤水期间伪装成红军主力在乌江北岸佯攻牵制敌人，单独行军作战近2个月，被称为“战略骑兵”。

汪洪清负责的敌军工作部主要工作是瓦解敌军、收集情报、开展统战。光有胆子不够，敌工干部还得脑子活、嘴巴灵、让人信得过，需要了解人、争取人。

汪中原说，父亲有着过人的语言天赋，“到了新地方，他很快就能学会当地的方言”。这让汪洪清在敌工工作中更加得心应手。

有一次，部队抓获了一个福建籍俘虏，一名来自福建的红军战士负责审讯。结束后，汪洪清问战士：“他说什么，你听懂了吗？”

战士摇头。

汪洪清当即翻译：“他说想回家，但是没有路条，也没有盘缠。”

福建方言复杂，省内不同片区之间往往难以互通。在场红军战士无不惊讶——一个湖北人，听懂了福建人都听不懂的福建话。

在汪中原的记忆里，父亲在湖北讲湖北话，到河南工作后说一口河南话，遇到湖南亲友能讲湖南话，陕西话也模仿得有模有样。

这背后，是他在长期革命实践中形成的观察能力和群众工作能力。汪中原认为，长期与不同群体接触、处理复杂关系的经历，塑造了父亲沉着机敏的性格。

一次，汪洪清外出执行任务，需要借宿在当地老乡家中。老乡提醒他说：“今天晚上可能有土匪经过，你还是换个地方吧。”

汪洪清没有离开，回复道：“没事，我住这里。有异常可以和我说。”

深夜，一伙土匪果然来到附近。老乡告诉对方：“汪胡子在里面。”

听到这个名字后，对方没有进屋，往门内望了望，转身离开。

汪中原解释，父亲年轻时留着络腮胡子，当地人称他“汪胡子”。长期革命实践中，汪洪清与群众、地方人员建立了稳固联系，也形成了一定的个人威信。

从红九军团敌工干部，到后来继续担任红军部队政治工作领导职务，汪洪清始终把与人沟通、了解群众、掌握情况作为自己的工作方法。

“我父亲走了49天草地”

汪洪清儿时没有受过系统教育，进入红军后，才真正开始学文化。

“行军走路的时候，前面战友的背包上写一个字，后面的人就跟着认一个字。”汪中原表示，当时行军就是课堂，战友的背包就是黑板，许多原本不识字的战士，在行军、学习和战斗中逐渐掌握文化知识。

几年下来，从纱厂走出的童工汪洪清已经能读书、看报，也逐渐成长为优秀的政治干部。

“我父亲走了49天草地。”汪中原说。

汪洪清很少向子女讲长征艰难，但和老战友聊天时常感慨：“大批红军牺牲在路上，连姓名和遗骨都没留下。”

汪中原说，父亲一生坚持原则。当年自己参加海军航空兵飞行员选拔，最后一关被刷下来了。当时地方的许多武装部长都是父亲的老部下，但他坚决不走关系不打招呼。父亲曾说：“你爹是你爹，你是你。国家给的荣誉和孩子无关。”

记者赵萌萌 实习生柳林萍 陈丽阳